

最近,在中国的
美国富布赖特基金经
济学访问学者,应邀
到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进行学术交流,与教
师和研究生共同讨论
美国经济、世界经济
和经济学理论等方面
的学术问题,并就美
国的精减管制,国际
债务危机,比较经济
制度和经济学方法问
题作了学术报告,现
将内容纪要如下。

世界经济和经 济理论动向探讨

——经济学院中美学术交流纪要

梁晓滨 方柄松

一、经济管制理论和美 国近年的精减管制

美国特拉华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B. A. 阿
布拉姆斯,以《经济管制理论:以银行业减少
管制为例证》为题,作了学术报告。

首先,他介绍了西方的经济管制理论,
其中 G. 斯蒂格勒 1971 年提出的“特殊利益
经济管制理论”很有特色。这种理论认为,管
制是政府服务的需求者(一般是特殊利益集
团和个人投票者)和这种服务的供给者(政党
和想要当官的人)相互竞争的产物,大多数
经济管制都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利。由于获得
政府的优待,特殊利益集团在和消费者集团
的对立中占有比较优势。为使自己部门获利
而要求实行管制,这是个规律,而管制会引
起低效率。

其次,关于近年来美国转而减少经济管
制,阿布拉姆斯认为,这正是政治市场上上
述供给和需求两股力量变化的结果。而减少
管制的倾向与以下三个前提一致。1. 教育前
提(education hypothesis)。经济中大多数
管制造成了低效率,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利益。
事实教育了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观点发生

转变,主张减少经济
管制。2. 思想前提
(ideology hypothe-
sis)。美国人的价值
观念发生了转变,普
遍否定“大政府”观
念,支持用较多的市
场方法解决经济问
题,减少政府干预。
3. 特殊利益立法
(Special interest
legislation)。经济环
境变了,原来受益于
管制的特殊利益集

团,现在从某些精减管制中得到更多的利
益。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前提的形成,美国才
出现了减少管制的运动。不过值得指出
的是,教育前提和思想前提促进了这一运动,
这说明:①公众和众多的消费者是执行减少
管制的工具;②在政治市场上,经济管制的
利益获得者相对于广大的普遍利益集团(gene-
ral interest group)失去了其政治力量。

最后,阿布拉姆斯具体介绍了美国银行
业精减管制的情况。美国政府对商业银行
的管制措施有对储蓄的利率限额、对活期存款
利息支付的限制和对银行开业及设分支机构的
严格限制。这些管制限制了商业银行的竞争,
降低了银行业投入(如存款)的费用。近
来这些管制不同程度被取消了,原因在于银
行本身的特殊利益要求放松管制。

早在七十年代初期,银行已摆脱了对大
额可转让存单的利率限制,银行家控制了对
自己行业的管制。正是在此时,货币市场互
助基金(Money Market mutual funds)成
为金融市场上重要力量,很多非银行机构提
供这种基金。商业银行不能通过政府管制遏
制非商业银行竞争者,于是要求政府取消那
些以前对他们有利,现在使他在与非商业银

行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各种限制。尤其是许多大银行支持减少管制。此外,大量单一银行倒闭的原因是没有分支机构,受地方经济状况制约。商业银行要求改善竞争条件的首要步骤,就是要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分散布点。

上述情况表明,银行本身支持政府减少对本部门的管制,变化的压力不是来自广大的银行服务对象。没有银行本身的支持,减少管制不可能发生。所以,银行业管制的减少,证实了“特殊利益经济管制理论”。

二、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债务危机

霍尔曼副教授围绕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债务危机作了学术讲演,其主要观点如下:

国际债务危机已出现几年了,尽管采取了应急性政策,发展中国家经济也有所恢复,但是引起债务危机的因素,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存在。为消除债务危机,商业银行、官发展援助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应发挥各自的作用。

商业银行贷款占发展中国家债务的主要份额。商业银行存在着某些结构性缺陷:

(1) 银行没有能力控制借款国总的负债额;(2) 贷款中的国家风险趋于集中,而且很严重;(3) 债务危机冲击和其它金融冲击在银行间通过金融市场传递,这种潜在的力量很强;(4) 最后贷款人不确定性和外国官方对债务责任不确定性。在这些情况下,商业银不得不增加非自愿的贷款。

在银行信贷大大增加的同时,官方发展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债务中比重下降,多边国际机构贷款保持相对稳定。官发展援助减少,是发达国家中保守的信奉市场机制的政府的政策。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号召商业银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贷款,

以缓和债务危机,就是这种政策的反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被置于国际金融舞台的中心,但财力有限,增加得缓慢。应付债务危机的方法集中到国际货币基金贷款上,但是,显然这不能起主要的作用。

那么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何在呢?霍尔曼认为要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减少对商业银行贷款的依赖,发展和调整计划的费用大部分由发达国家和商业银行承担,同时要求债务国采取相应的自制行动。具体方法有:(1) 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能力,提高基金组织的灵活性,延长贷款期限,降低利率。(2) 加强对国际信贷活动的管制,建立特殊的外国贷款储备,转移贷款费用,改善贷款种类等等,这可加强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3) 创设新的金融工具,如可变期限贷款、指数化贷款、用利息资本化代替新货币等。(4) 世界银行合作融通资金,但这种资金数量较小。

上述措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度过债务危机,但并不是长期解决办法。长远办法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提高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具体方法有:(1) 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便利条件,尤其是贷款利息费用变化的条件。(2) 扩大对银行信贷的保险和保障计划。(3) 扩大多边机构合作融通资金。(4) 发展二级市场和二级贷款机构。此外最重要的是取消发达国家对进口的限制。

三、目标、行为标准与政策手段

鲁宾(Rubin)教授以“目标、行为标准与政策手段”为题,比较概括地讨论了大体属于西方比较经济学领域的几个问题。虽然他没有就任何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对比,但他的目的本来就是要“确立一个试图以尽可能客观的眼光观察分析不同经济制度的方法”。所以整个讨论是有关方法论的,也是一般和概略的。

那么应该怎样去观察分析不同的经济制度呢?首先鲁宾教授认为这是一个牵涉到人

们的价值判断的问题，但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尽可能地客观。在这一指导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析确定不同社会的目标。他说，目标的确定应根据对各有关不同社会的客观分析，而不能主观臆断。但一般可分两个层次，其一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经济目标，如社会的物质福利、平等、法律与秩序的完善、政治稳定、缓和社会紧张、鼓励提高社会道德等。这是最高层次的，也是最一般化的，所以还无法对之进行实际的、衡量对比。为此应过渡到第二个层次，即各具体的经济目标，如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贫困的减少或消除，等等。显然这种列举还可以进行下去，而且不同的学者也可能有不同的列法。

在上述一般的目标体系中，哪些是各不同的社会在各不同的时期所关注的？鲁宾教授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大体上有四条途径可循，一是查看官方文件，如预算报告，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等，这些文件一般会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各有关政府在有关方面所确立的目标。问题是这类文件中的不少内容往往是宣传性质的，所以不一定很可靠。二是进行公开的调查，如美国七十年代中期进行的消费者意向调查，由公众的意向间接推寻有关社会目标。但问题是，一方面公众意向本身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另一方面由此也无法确切得出具体的社会目标。三是分析有关国家领导人物的讲话，看看这些讲话中那些观点、事件、词语是反复出现的，例如纽约时报上有里根的讲话，真理报上有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等，这些讲话对他们各自寻求的政策目标均会有所阐述或透露，只是同样存在宣传性因素的问题。四是所谓的倾向观察，也就是去观察各不同国家的政策行为而不是其言论，由不同国家的不同行为分析确定各自不同的目标。这种方法的问题是：由于各国所面临问题不一样，所以各国的行为和倾向并不能准确反映各自的目标层次。例如在一个失业率不高的国家，减少失

业的政策行为较少，但这并不表明充分就业不构成其目标。可见，所有这些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应该兼而用之。

确定了目标之后，还有必要确定一些原则标准对之评价，鲁宾教授所谓的行为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s)就属此。可分六个方面：1. 经济增长；2. 动态的效益；3. 经济稳定；4. 静态的效益；5. 消费者主权；6. 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鲁宾给出了每个方面的具体指标，并分析了这些指标本身的问题。以经济增长为例，具体的衡量指标一般是国内总产值，它体现的是经济增长状况以及国民福利水平。但问题是，该指标不包括很多影响经济发展或国民福利真实水平的因素，例如闲暇时间、家务劳动、污染等。而且在做国际对比时，也还有一个统计口径是否一致的问题，此外就是所谓指数问题(index number problem)，即计算同一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由于所用价格不同，得出的结果也有别，这一问题在分析同一国家经济结构变化前后或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时尤为突出。

鲁宾教授指出，上述各方面的指标经常出现于西方经济文献之中，不少东欧国家也经常运用。在中国可能并不完全恰切可用，但对中国分析其政策而言无疑是有一定意义的。

四、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与语言结构变化

在当前的西方经济学中，越来越艰深的数学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了起来。这一过程是如何开始的？对经济学本身有什么影响？霍尔曼(Houlman)副教授以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为出发点，从经济学的语言结构变化方面谈了他的看法。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所谓边际革命，导致了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自此，经济学

家的注意力从分析分配方面转向在给定生产要素供给量的条件下寻求资源最优配置方面，也就是转向所谓“约束最优化”(Constrained optimization)。这样，经济学第一次成为研究给定的目标与给定的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关系的科学，静态的一般均衡理论取代了强调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古典学派经济理论，边际分析方法或约束最优化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用到经济学的许多领域。

这有什么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但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当人们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结构表述经济学的有关问题时，数学演算就变得相当重要了。这也就是说，边际革命为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可以运用数学的理论框架，正是这个框架中，经济学家们才可能以一种可以有效运用数学推理的方式分析讨论问题。所以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是与经济学本身的边际革命一道开始的。

但是，数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却要比边际概念的广泛运用晚得多。乔治·斯蒂格勒发现，本世纪二十年代前，主要的美国经济学杂志上很少见到运用数学的文章，1920至1923年这类文章占2%，1932至1933年也只占10%。数学的迅速推广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的事。虽然如此，变化到底是发生了，而且范围日益扩大。

经济学的表述和推论方式自文字语言系

统转化为数学语言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所谓的“转换”(transformation)和“翻译”(translation)，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因为在转换和翻译过程中，往往要用到“被动化”(Passivization)和“标准化”(Normalization)方法，前者如自主语态变为被动语态，后者如自某一具体的表述变为某一概括的表述。虽然变化前后的句子所描述的对象相同，但由于结构的差别，两者的信息内容和含量并不完全一致。与变化前的句子相比，变化后的句子在所含的信息上往往会少点什么或变了点什么，这就是语言结构变化的影响。经济学因导入数学而发生的语言结构变化同样有这种影响，明显的表现是：数学的导入使经济学中思想意识方面的论述和观点消失，社会关系也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但是，不导入数学，经济学的很多问题又是很不好解决的。所以问题不是数学的导入是好是坏，而是要充分意识到数学导入对经济学造成的种种影响。遗憾的是我们还未意识到，因此造成了不少问题。例如人们构造模型时，只将注意力集中于模型本身的构造，而忽视外在于模型但有先决意义的给定条件，就是明显的表现。

霍尔曼最后总结道：边际革命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提供了一个可用的框架，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一般是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的，但由此而来的经济学语言结构的变化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